

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 生态与环境研究系列报告



岱海地区东周墓群发掘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

曹建恩 主编

孙金松 党郁 副主编



科学出版社

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系列报告：二

岱海地区东周墓群 发掘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 编著

曹建恩 主编

孙金松 党郁 副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项目“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内蒙古课题组的成果之一，系统介绍了岱海地区三处东周时期墓地——忻州窑子墓地、小双古城墓地、水泉墓地的发掘成果，报道了各类墓葬110座，各类遗物千余件。这三处墓地表现出了多元的文化内涵、风格迥异的墓葬制度、各具特色的殉牲习俗、丰富的随葬品种类以及草原文明与农耕文化的碰撞、冲击与融合，为研究内蒙古中南部早期游牧文化的谱系、起源、社会结构、人群迁徙等，提供了丰富的、翔实的资料。

本书适合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者及相关专业高校师生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岱海地区东周墓群发掘报告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编著. 曹建恩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03-042732-8

I. ①岱… II. ①内…②内…③曹… III. ①周墓-墓群-发掘报告-凉城县-东周时代 IV. ①K878. 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8746号

责任编辑: 王 钰 / 特邀编辑: 宋小军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3 1/2 插页: 22

字数: 550 000

定价: 3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报告出版得到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项补助经费
资助

序 一

20世纪90年代初，迫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曾向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提出建议：一是在市场经济正在发展的地区，应依据文物保护法，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二是应组织力量，积极做好尚待开发地区的文物调查与勘探工作。后者的目的，是抢在这些地区开发之前，能对这些地区的文物，尤其是其中的地下文物做到心中有数，以便这些地区面临开发之时，向有关部门明示文物保护方案，减少文物保护工作与经济建设之间不必要的矛盾，主动地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为此，我还建议，负责文物调查与勘探工作的业务单位，除发表有关报告之外，还应将调查与勘探的有关资料，报送有关文物行政部门并向这些部门提出某些重要遗址应列入何级保护单位的建议。在我看来，我的这些建议无疑是将考古工作纳入文物保护，为实践文物保护法、有效地做好文物保护的一种策略。

1995~1996年在美国讲学期间，为同许倬云教授共同探讨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我对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及谱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思考，并向许倬云兄提出共同促成中美合作在长城地带开展考古工作的建议。在此之前，继80年代初明确提出两种经济类型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后，我又提出了牧业和农业两类文明的想法。这是我组织赤峰考古队的一种动机和追求。我向倬云兄提出的上述建议，由于双方的努力，以及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终于使我和林嘉琳教授结成了合作伙伴。原先，我想按照组织赤峰考古队的动机及追求的设想，共同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开展考古工作，实现河套和赤峰两地区工作的相互策应，并逐步地由东向西将整个长城地带的考古工作开展起来，但林嘉琳教授却选择了赤峰地区。

在河套地区进行考古工作，和自此由东而西将整个长城地带的考古工作逐步开展来的想法，一直萦绕着我的头脑而不能自制，这当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早在20世纪的60年代，我就相当关注黄河两岸陕晋零星出土的一些青铜器，70年代末，接受秉琦师的建议于张家口地区开展考古工作，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想在这一地区探寻以“绥远青铜器”为代表的遗存。80年代前期，在白燕遗址见到的那些与鄂尔多斯相似或相同的新石器时代及夏代的遗存，尤其是于此发现几座出有与黄河两岸的陕晋地区零星出土的青铜器伴出的形式相同的金耳饰的墓葬，吸引我将吉林大学的考古工作推到忻州盆地和河西走廊，增强了我在黄河两岸及河套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的愿望，自上述我在美国对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了系统整理之后，认识上才出现质的飞跃，产生了应去长城地带开展考古工作以及如何进行工作的较系统认识，才可能向许倬云教授提出共同促成中美

合作，共同开展长城地带考古的建议。

自有了组织赤峰考古队的那些追求之后，在开发大西部的背景下，我认识到将包括河套地区在内的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设想付之于实践已刻不容缓。1999年，我邀乔梁、曹玮和魏坚共同考察了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及吕梁地区的一些遗址，以及这些地区以往考古工作收集的资料，特别是陶器（片）。之后，撰写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生业、文化与环境》。2000年9月，我应邀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国家文物局西部文物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开展西部考古与作好文物保护工作有关内容的发言，会后又考察了石河子及哈密地区。同年10月，我还应邀参加了文化部在青海西宁召开的西部文化工作座谈会，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考古学——连接中国西部古代之桥》的发言。通过这些活动，自认为在开发大西部的形势下推进中国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思考已经成熟，便向张柏副局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张柏副局长等国家文物局的有关负责同志认真听取了 my 的意见，同时我们共同认为，包括长城地带在内的中国西部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限于人力与物力，只能取点面结合，逐步进展的策略，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点上的工作，我们只能先从河套地区开始。

这就是提出“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课题的由来。在国家文物局支援下，2003年3月，我建议并会同杨志军于故宫博物院主持召开了内蒙古、山西、陕西三省区考古所课题负责人会议。会议就我提出的课题目标以及如何进行课题研究诸业务性问题进行了讨论，统一了认识。杨志军据我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这一课题的意见和国家文物局的决定，宣布我为这一总课题的负责人，总课题组的成员是：杨晶、李水城、杨建华、朱泓、乔梁。总课题组下设内蒙古、山西、陕西三个课题组；负责人分别是：塔拉、曹建恩，马升、谢尧亭，曹玮、王炜林。并要求相关单位积极支援课题组的工作，实行专款专用，并从人力、物力方面保证课题组工作。总课题组及其成员的活动经费由各省（区）课题经费中支出。我在这次会上发了言，说自己虽为课题组总负责人，但不参加具体的学术研究，只出些点子和做些督察工作，总课题组成员协助我做些工作，并以自己的专长和兴趣自选学术课题研究。杨晶除做上述工作外，还承担总课题组的行政事务工作和各省（区）课题组的协调事宜。这次会议，当是“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课题的正式启动。

从上述我对这一课题的思想形成过程的叙述，似乎已讲清楚了这一课题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一课题研究的问题。为了明晰起见，还想对此做些概括性说明。

1. 课题目标

一是学术研究，二是文物保护，并以学术研究推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的任务是：一是搞清楚河套地区考古学文化和诸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以及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其周边文化的关系；二是要搞清楚这一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生业与产业。生业包括农牧的转化或更替，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和牧业发展的阶段性；三是从上述研究产生的认识中获取今人应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2. 实践课题目标的途径

1) 在以往学术研究的基础上, 各省区选择一条可能实现研究课题目标的不大不小的河流, 做出规划报国家文物局和总课题组, 经批准后, 于此河流域地区进行全面的调查与勘探, 掌握其先秦两汉时期遗存的分布, 主要遗存的范围、面积、文化性质和文化堆积情况。同时, 为了解决课题提出的学术研究的需要, 选择某些遗址或墓地进行试掘或发掘。各省区关于调查、勘探河流地区的选择, 和选择何遗址或墓地进行试掘或发掘, 应在地理位置和年代或文化, 或问题探讨等诸方面相互配合, 做到互补。这方面的协调工作, 由总课题组负责。

2) 除上述工作外, 可将与本课题有关的以往调查或发掘并尚需整理、研究发表报告的资料, 经报总课题组同意后, 可将其列入本规划。

3) 适时将调查、勘探、试掘或发掘的遗址或墓地的情况通报有关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协助其建立档案, 纳入其保护视野, 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 向有关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某些遗址或墓地等遗存应列入某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议。

4) 对所获得的遗存进行生物、物理、化学和地质学等有关的科学技术的测试、鉴定和研究, 以扩大和提高从遗存获取资讯的质量, 是本课题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因此, 必须吸纳这些学科参与课题的研究。如何吸纳, 请各省区课题组自行解决。

3. 资料的保存、保护与研究著作的出版

1) 调查、试掘和发掘所获得的陶片, 应尽可能进行复原。调查、勘探、试掘和发掘所获得的实物、文字、图片, 和整理、编写报告过程中所复原或修复的器物及形成的文字、图片的资料, 必须建档和妥善保存, 以便展示或备日后他人检索和研究。

2) 报告是文物保护的一种形式, 也是本课题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表述方式, 必须认真对待, 高质量地做好这件工作。报告的总名称为《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系列报告》, 依出版先后编序。报告除由编辑单位分送学者及有关学术单位外, 应以相当的数量投入市场, 同时, 需送总课题组90本, 其中60本由总课题组送国家文物局。

3) 综合研究则由个人进行。总课题组(或据省区课题组的建议)认为必要时, 则适时地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讨论, 将交会讨论的有一定研究水平的论著合集出版, 编入《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系列报告》。

这是本研究课题的目标, 存照于此, 内明约定, 外求监督。队伍已经集合, 我相信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目标定将实现。

是以为序。

張忠培

2004年10月18日成稿于台湾云林斗六市

序 二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使古代遗址的保护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大量基础设施的兴建，使古代遗址的保护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文物工作者，在建设工程中经常扮演着抢险队员的角色，所谓的“随工清理”往往将文物保护工作置于非常被动的境地。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对文物遗存的家底掌握不清。为了改变目前的这种被动局面，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除了继续加强依法行政外，更重要的是要按照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地区差别，来布置好各地的文物工作。经济建设较快的地区，往往文物保护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也更为突出，我们必须抽出专门的人力，投入一定的资金到这些地区行将开发的地段，以保护文物为目的，进行一些必要的考古调查，摸清该地区地下文物的家底，依法确定一批不同等级的遗址保护单位，作为未来制定建设规划的依据，这样就可能变被动为主动，做好现代化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

前些年，我曾就文物保护问题经常与张忠培先生交换看法。上述这种变被动为主动，走在经济建设前面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思路成了我们的共识。不仅如此，张先生还认为，任何时代的考古学都存在着局限性，为考古研究而进行的田野发掘，应主动接受两方面的制约：一是学科发展的水平，能否认知发掘对象；二是出土的文物能否得到妥善的保存。凡是考古学科水平不能认知的，或出土文物不能妥善保存的，都不应将其列入发掘计划。惟其如此，才能正确处理好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的关系，考古学也才能真正得到持续性发展，文物保护是考古学研究自在之义。1995年，张忠培先生提出了他的设想，拟在北方的赤峰地区组织一次以保护地下遗存为宗旨，保护、研究、教学三者紧密结合的考古工作，在提高考古研究水平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调查与试掘，以确定遗址的分布、规模和保护级别，作为行政部门保护文物的科学依据。国家文物局从行政和财力方面支持了这个设想的实施，经过5年的艰苦工作，张先生领导的赤峰考古队在2002年向学界提交了《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这项可喜的成果，首次向社会展示出了赤峰地区西南部文物资源的一份底账，这些成果不仅为遗址保护奠定了可靠的科学基础，同时对日后的考古研究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许是受到赤峰考古成果的鼓舞，张忠培先生以其对北方考古研究的丰厚学术积淀和情愫，又适时地提出了以赤峰考古的模式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开展考古工作，以实现河套和赤峰两地区工作的相互策应、并逐步地由东向西将整个长城地带的考古工作开展起来的设想。

1999年，张先生继1992年和黄景略先生考察陕北之后，又同乔梁对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及吕梁地区的一些遗址进行考察，并发表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生业、文化与环境》这篇内涵深刻的著作，随后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国家文物局西部文物工作会议”上及文化部在青海西宁召开的西部文化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考古学——连接中国西部古今之桥》之讲话，该文内容广泛，我同张先生就他的这个讲话，特别是他对西部大开发中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些思考，也交换过意见。我们的共同认识是：包括长城地带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不仅是西部开发和水土流失等自然力破坏的敏感地带，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敏感地带，这里的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必须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但考虑到当时的人力与物力，我们最终选择从河套地区开始来实施这一设想。

2003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由张忠培先生负责的“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课题开展三年来，内蒙古、山西、陕西三省区的考古所，根据课题的需要，分别对内蒙古中南部的浑河流域、山西柳林县三川河流域以及陕北无定河支流大理河流域进行了地毯式调查，涉及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并对清水河县的西岔遗址、柳林县的高红遗址、横山县金山寨遗址、瓦窑渠遗址、子洲县的三眼泉遗址等进行了发掘，陕西省还根据课题研究需要，对先期发掘的神木新华遗址的古代环境重新进行了研究。这个项目的良好开局已呈现在人们面前。我由于工作太忙，没有机会像赤峰考古那样，亲自去体验考古队员的辛苦并分享他们的欢乐，但每年的汇报资料却令人鼓舞。目前，该课题正沿着既定的目标，即张忠培先生所言的“一是学术研究，二是文物保护，并以学术研究推动文物保护”的方向顺利进行，一系列研究成果即将陆续展现给学界！我认为，“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课题的实施，不仅像赤峰考古那样，体现了在地下文物的保护上打了主动战，再次证实了围绕文物保护开展考古工作这个思路的可行性，其以重点发掘带动区域调查的方法，也对摸清河套地区地下文物之家底，建立相关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非常重要之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在实施中，就像它的题目所表达的那样，强调了这一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生业、环境之关系，其成果中农牧的转化或更替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和牧业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之展示，不仅将我国北方地区考古的研究引向了一个很深的层次，而且对国家正在这一环境脆弱地区实施的经济开发战略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项目的实施，必将为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向故宫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以及向该项目实施提供过支持和帮助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向参加该项目研究的全体考古队员致以敬意！


2005年3月

序 三

欣闻《岱海地区东周时期墓地发掘报告》即将付梓出版，曹建恩找我为此报告写序，由于我熟悉相关工作，因此欣然命笔。

岱海地区位于内蒙古中南部凉城县，是阴山山脉与吕梁山脉交汇之处，这里丘陵山脉连绵不绝，河湖密布，黄土发育深厚，自然环境十分优越，是古代居民繁衍生息理想之地，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自20世纪80年代始，田广金、郭素新两位考古前辈心无旁骛、不辞辛苦连续在这里做工作，经十余年的努力研究，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这一地区自石虎山文化至毛庆沟墓地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内蒙古中南部考古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毛庆沟墓地的发现，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研究领域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毛庆沟墓地的各类论文在研究刊物上不断发表，由此证明了这一批考古资料所蕴含的持续的研究魅力。

本报告发表的忻州窑子、小双古城、水泉墓地是继毛庆沟墓地之后又一重要考古发现，与毛庆沟墓地相比，这次的考古发现更为丰富，从生业角度分析，因具有不同程度的游牧性质，与毛庆沟墓地既存在区别又有联系。四个墓地的材料富集于一地，必将对内蒙古中南部尤其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研究，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鄂尔多斯青铜器曾因称为“西番片”，在旧中国的文物市场上名噪一时，新中国成立后，鄂尔多斯青铜器田野考古学研究开始起步，但在20世纪50~70年代，鄂尔多斯青铜器考古发现多为零散的征集品，研究价值大打折扣，自1973年以桃红巴拉墓地的发掘为标志，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研究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自此至20世纪90年代又连续发现了准格尔旗西沟畔、伊金霍洛旗石灰沟、乌拉特前旗呼鲁斯太、包头市西园、凉城县毛庆沟及崞县窑子等一系列墓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我有幸在1982年主持了乌拉特前旗呼鲁斯太墓地的发掘工作，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资料很少，虽然后来主持了与呼鲁斯太墓地大体同时的林西县井沟子墓地的发掘，但因未在内蒙古中南部，未能持续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至今仍视为一件憾事。进入21世纪，清水河县阳畔墓地、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以及凉城岱海东周墓地的系列发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完整的科学资料，本人虽未亲历这些工作，但看到鄂尔多斯青铜器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集中于农牧转化、游牧起源、人群迁移、社会结构等更广阔的领域，亦不禁甚感欣慰。

岱海地区东周墓地的系列发现，是张忠培先生主持的“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的组成部分，2000年，张忠培先生确立此课题并找我商量内蒙古

分项负责人的人选，由于我当时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内蒙古东部地区，无暇他顾，便郑重向先生推荐了曹建恩作为分课题负责人，先生欣然应允，由此“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的文化、生业与环境”这一课题得以在内蒙古顺利开展。

2006年，“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的文化、生业与环境”在内蒙古的野外工作全面结束，成果相当丰富，根据我的观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现了清水河西岔遗址，填补了内蒙古中南部朱开沟文化至毛庆沟墓地之间的考古学空白，使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与陶器群联系起来，结束了学术界长于研究孤立的商末周初鄂尔多斯青铜器，而对共存陶器研究不足的局面；二是在浑河流域下游地区的280平方千米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考古调查，发现367处先秦两汉时期遗址，并对此一区域内的多处重要遗址进行了考古试掘，所获资料对于探索这一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环境、生业、文化，社会的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三是在清水河和林格尔县的浑河沿岸以及凉城县的岱海地区发现6处具有游牧性质的东周时期墓地，为早期草原游牧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曹建恩自承担“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的文化、生业与环境”项目以来，带领杨星宇、孙金松、党郁等几个年轻人，数年工作于黄河沿岸的穷乡僻壤中，潜心研究，其中之辛苦寂寞多不为世人所知。由于我全程参与了这一重要项目，因此一有暇余，便去工地看望他们，每次去工地，吃酸捞饭，喝旱井水，说考古轶事，谈工地新发现，虽然环境异常艰苦，但同事们却乐观、充满朝气，我的考古情怀就会与他们快乐地融合在一起，令我流连忘返。

由曹建恩带领的年轻团队用青春触摸五千年历史时空，用智慧踏遍南流黄河沟沟坎坎，甘于寂寞抛洒汗水，付出了艰辛，也获得了成果，希望他们写出更多的论文报告，让学术界分享他们的快乐。



2015年10月

前 言

2003年始依照张忠培先生所主持的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项目“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的课题思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对位于岱海地区的忻州窑子、小双古城与水泉墓地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清理东周时期各类墓葬110座，出土各类遗物千余件。

忻州窑子、小双古城与水泉墓地地处以内蒙古凉城县岱海为中心，马头山系以北、蛮汉山系以南的广大区域，独立的地理单元格局与环境特征造就了这一区域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分布特征，学界熟识的毛庆沟、饮牛沟、崞县窑子及草号沟等墓地均位于此区域，成为内蒙古中南部乃至北方长城沿线地带东周时期早期草原游牧文化研究的黄金地带，对于探讨农牧转化、辨析游牧人群迁徙路线、推进早期游牧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十余年研究结果表明，岱海地区所发掘的诸如毛庆沟、饮牛沟等东周时期墓地与中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存在明显不同，诸如大量使用马、牛、羊头骨进行殉牲，随葬北方系青铜器的特征差异在毛庆沟墓地发掘后即被认知，发掘者随即认为“毛庆沟墓地是一处古代北方少数部族的墓地”“属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生业形态虽以畜牧业为主，但并不是纯游牧状态……”由此关于游牧文明定性、游牧经济的产生及早期游牧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等诸多问题遂成为学界探讨的中心，其中林沅先生称此类遗存为“北方长城地带的考古学文化”；乌恩先生则将“毛庆沟等文化”统称为“长城地带中段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杨建华先生将其称之为“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墓葬”……此后一段时间，以林沅先生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乌恩先生的《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及杨建华先生的《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墓葬习俗比较》为代表的学术专著纷纷问世，树立了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文明研究的里程碑。

忻州窑子、小双古城与水泉墓地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自1979年毛庆沟墓地发掘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综合性考古学研究工作，多元的文化内涵、风格迥异的墓葬制度、各具特色的殉牲习俗、丰富的随葬品种类以及草原文明与农耕文化的碰撞、冲击与融合，为构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早期草原游牧文化体系提供了可能性，为寻找真正意义上的“马背民族”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此为中心开展的关于内蒙古中南部早期游牧文化谱系、起源、社会结构、人群迁徙等课题研究必将成为今后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回首过去，对于忻州窑子、小双古城与水泉墓地所开展的十余年考古发掘与研究工
作，既充满了未知的挑战和发掘的快乐，也留下了些许遗憾与不足。今天，《岱海地区
东周墓群发掘报告》付梓印刷即算是我们对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早期草原游牧文化研究
的阶段性的总结，但随即亦会产生新的困惑和挑战，这或许就是研究的魅力吧。最后感谢
多年来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内蒙古自
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领导和同仁们。

目 录

序一	张忠培 (i)
序二	张 柏 (v)
序三	塔 拉 (vii)
前言	(ix)
第一章 发掘概述	(1)
第一节 地理位置及环境	(1)
一、概况	(1)
二、植被和野生动、植物	(3)
三、畜牧业	(6)
第二节 历史沿革	(10)
第三节 发掘整理经过	(12)
第二章 忻州窑子墓地	(14)
第一节 范围与地貌	(14)
第二节 埋葬习俗	(14)
一、形制	(14)
二、葬式与人种性征	(19)
三、殉牲	(22)
四、随葬品种类和数量	(28)
第三节 墓葬介绍	(50)
第三章 小双古城墓地	(168)
第一节 范围与地貌	(168)
第二节 埋葬习俗	(168)
一、形制	(168)
二、葬式与人种性征	(171)
三、殉牲	(172)

四、随葬品种类和数量·····	(175)
第三节 墓葬介绍·····	(185)
第四章 水泉墓地·····	(213)
第一节 范围与地貌·····	(213)
第二节 埋葬习俗·····	(213)
一、形制·····	(213)
二、葬式及葬具·····	(217)
三、殉牲·····	(219)
四、随葬品种类和数量·····	(221)
第三节 墓葬介绍·····	(228)
第五章 结语·····	(261)
一、文化性质·····	(261)
二、年代·····	(263)
三、经济形态·····	(263)
四、社会状况·····	(265)
附录·····	(268)
附录一 内蒙古忻州窑子、小双古城墓地青铜器分析调查报告·····	(268)
附录二 内蒙古凉城县水泉墓地人骨研究报告·····	(279)
附录三 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人骨研究报告·····	(287)
附录四 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人骨研究报告·····	(289)
附录五 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殉牲研究·····	(305)
附录六 内蒙古凉城县忻州窑子墓地殉牲研究·····	(311)
附录七 内蒙古凉城县春秋时期古代马线粒体DNA分析·····	(322)
附表·····	(328)
附表一 忻州窑子墓地统计表·····	(328)
附表二 小双古城墓地统计表·····	(341)
附表三 水泉墓地统计表·····	(344)
后记·····	(348)

插图目录

图一	岱海地区东周墓群分布图	(4)
图二	忻州窑子墓地地理位置示意图	(15)
图三	忻州窑子墓地总平面图	(16)
图四	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陶肩双耳罐	(29)
图五	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陶素面无耳罐	(31)
图六	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陶无耳绳纹罐	(34)
图七	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陶平双耳罐及其他陶器	(35)
图八	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铜鸟纹牌饰	(37)
图九	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铜管状饰	(39)
图一〇	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铜环	(41)
图一一	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铜饰	(42)
图一二	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铜扣饰	(43)
图一三	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铜带扣	(45)
图一四	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铜联珠饰、铜铃	(46)
图一五	忻州窑子墓地出土骨器、石器、蚌器、贝饰、玛瑙器	(49)
图一六	忻州窑子墓地M1、M2随葬品	(51)
图一七	忻州窑子墓地M2平、剖面图	(52)
图一八	忻州窑子墓地M3平、剖面图	(54)
图一九	忻州窑子墓地M4平、剖面图	(55)
图二〇	忻州窑子墓地M3、M4随葬品	(56)
图二一	忻州窑子墓地M5平、剖面图	(58)
图二二	忻州窑子墓地M5、M6、M8随葬品	(59)
图二三	忻州窑子墓地M6平、剖面图	(60)
图二四	忻州窑子墓地M7平、剖面图	(61)
图二五	忻州窑子墓地M8平、剖面图	(62)
图二六	忻州窑子墓地M9平、剖面图	(63)
图二七	忻州窑子墓地M9、M10随葬品	(64)
图二八	忻州窑子墓地M10平、剖面图	(66)
图二九	忻州窑子墓地M11平、剖面图	(68)
图三〇	忻州窑子墓地M11、M12、M13、M14随葬品	(69)

图三一	忻州窑子墓地M12平、剖面图	(70)
图三二	忻州窑子墓地M13平、剖面图	(71)
图三三	忻州窑子墓地M14平、剖面图	(73)
图三四	忻州窑子墓地M15平、剖面图	(74)
图三五	忻州窑子墓地M15、M16、M17随葬品	(75)
图三六	忻州窑子墓地M16平、剖面图	(76)
图三七	忻州窑子墓地M17平、剖面图	(78)
图三八	忻州窑子墓地M18平、剖面图	(79)
图三九	忻州窑子墓地M18、M19、M21出土随葬品	(80)
图四〇	忻州窑子墓地M19平、剖面图	(82)
图四一	忻州窑子墓地M20平、剖面图	(83)
图四二	忻州窑子墓地M20、M22随葬品	(84)
图四三	忻州窑子墓地M21平、剖面图	(86)
图四四	忻州窑子墓地M22平、剖面图	(88)
图四五	忻州窑子墓地M23平、剖面图	(90)
图四六	忻州窑子墓地M23、M24、M25随葬品	(91)
图四七	忻州窑子墓地M24平、剖面图	(93)
图四八	忻州窑子墓地M25平、剖面图	(94)
图四九	忻州窑子墓地M26平、剖面图	(95)
图五〇	忻州窑子墓地M26、M27随葬品	(96)
图五一	忻州窑子墓地M27平、剖面图	(97)
图五二	忻州窑子墓地M28平、剖面图	(99)
图五三	忻州窑子墓地M28随葬品	(100)
图五四	忻州窑子墓地M29平、剖面图	(102)
图五五	忻州窑子墓地M29、M30、M31随葬品	(103)
图五六	忻州窑子墓地M30平、剖面图	(105)
图五七	忻州窑子墓地M31平、剖面图	(106)
图五八	忻州窑子墓地M32平、剖面图	(108)
图五九	忻州窑子墓地M32、M33出土随葬品	(109)
图六〇	忻州窑子墓地M33平、剖面图	(111)
图六一	忻州窑子墓地M34平、剖面图	(113)
图六二	忻州窑子墓地M34、M35、M36出土随葬品	(114)
图六三	忻州窑子墓地M35平、剖面图	(115)
图六四	忻州窑子墓地M36平、剖面图	(116)
图六五	忻州窑子墓地M37平、剖面图	(118)
图六六	忻州窑子墓地M37、M38、M39随葬品	(119)